



决策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

JUECE ZHONGGUO

GAIGE KAIFANG YILAI ZHONGGONG JUECE TIZHI DE LISHI YANJIN

沈传亮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决策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

JUECE ZHONGGUO

GAIGE KAIFANG YILAI ZHONGGONG JUECE TIZHI DE LISHI YANJIN

沈传亮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 春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沈传亮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01-014030-8

I. ①决… II. ①沈… III. ①中国共产党-决策程序-党史-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234 号

决 策 中 国

JUECE ZHONGGUO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

沈传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4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4030-8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应邀为传亮君的专著《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一书作序，我感到十分高兴。

传亮君于2010年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有幸成为他在站期间的合作导师，指导他开展相关专题的研究。他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专门从事中共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根据他的研究特长和研究兴趣，同时结合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的考虑，建议他在博士后期间把党史研究特长和政治学研究的新要求相结合，考虑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史进行专题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感到这个专题过大，不好驾驭，最终协商确定将研究题目确定为目前的题目，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研究》。传亮君在不脱产从事博士后工作3年期间，潜心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其间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和汗水。博士后研究报告出来后，他又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传亮君的博士后报告在出站答辩过程中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被评为“优秀”。随后，他又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对博士后报告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增加了8万字，特别是增加了一些鲜

活的决策案例，使全书读起来既有学术研究的深度，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应邀作序的过程中，我又将传亮君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通读了一遍，感觉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向读者大力推荐。

首先，本书的选题意义重大。中共决策体制特别是中共中央决策体制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枢纽之所在。推进中共政策过程民主，实现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层面决策的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是提高决策质量并进而提高中国国家治理水平的关键之所在。传亮君对中共决策体制历史演进的专题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共决策体制的改革、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次，本书的研究方法科学。传亮君将党史研究“史”的研究和政治学决策理论研究“论”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对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变迁展开了科学的研究。传亮君按照决策理念、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决策机制、决策特征五个要素，对中共决策体制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归纳概括出了每个阶段决策体制的基本特征。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决策体制的特征，按照独立与依附的轴线，分阶段进行了概括，具体包括独立—依附型决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面前）丧失独立性的依附型决策、自主型决策等不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按照个人专断与集体决策的轴线，将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共决策体制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6年为集体决策、分工负责阶段；1957年后，病变为个人专断决策、集体讨论通过的决策体制；1978年后的中共决策体制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走上了决策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轨道，形成了“中共各级党委主导的有限协商决策”的模式。传亮君对不同时期中共决策体制特征形成和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最后，本书的分析客观公允。中共各个时期的决策体制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时期既有正确的决策，也出现过重大的决策失误。传亮君对中共各个时期决策体制基本特征的概括不带主观感情色

彩，力求客观、准确、到位，让人有恰如其分之感。传亮君对中共各个时期决策体制利弊得失和形成原因的解释，同样做到了客观公允。他既指出了特定阶段中共决策体制的优点，又分析了它们的不足，同时对其成因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杜绝了一面倒的批判或一味的赞美，体现了一位优秀学者治学严肃严谨的态度。

当然，本书作为一部研究中共决策体制演进的专著，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传亮君所提供的决策案例多为重要报告的起草过程，而有些重大决策并非是通过重要报告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些决策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但其决策机制不同于重要报告的起草过程。再如，传亮君对协商决策相比于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优势的强调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共决策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走向政策过程民主还是走向协商决策，仍有进一步争论的空间。当然，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真理，谁也不能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让别人服膺于自己。学术观点的多样化，可选方案的多样化、对于社会政治进步来说必不可少。

我相信传亮君的《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历史演进》一书，对于对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理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对于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都将使他们从中获益良多。

何增科

2014年8月14日于美国波士顿

导 言

DAOYAN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范围

参加工作以来，出于岗位需要和兴趣所致，笔者主要从事改革开放史研究，尤其侧重政治史领域研究。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史尤其重要，但很少有人下功夫来梳理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当外界质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时，学界很少有人能用翔实的历史事实来回应，有的人云亦云地说一些宏观上的套话或正确的废话。中共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时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国内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步伐并不一致，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进步，在什么方面还有欠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实事求是地改进？回答这些问题，是学人的责任和担当。起初，笔者想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这个方面进行初步梳理，目的在于理清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进展状况及面临的问题要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到底改了没有、改了哪些、改到啥程度，借此来督促自己的研究并解答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初步研究后，发现此题目涉及的内容广泛驳杂、不好把握，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遂在著名政治学者何增科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下，确定了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的一部分内容即中共决策体制变革，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决策体制变革为重点展开分析。当然，明了该阶段的决策体制变革必须回溯中共决策体制的建立与形成，把视野放宽至1921年中共成立。这是因为，中共决策体制建立于民主革命时期，而制度本身具有延续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决策体制带有明显的革命化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才逐渐作别革命时期的决策传统，向制度化、科学

化、民主化方向不断演进。

之所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大框架中选择这一题目，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党政关系、党际关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均有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历史脉络的梳理已较为细致。研究这些题目的空间虽还不小，但创新的难度依然较大。而中共决策体制变革尽管有人关注，但还远未充分展现它原有的曲折复杂，多数论著并未触及，即使触及了，也多是泛泛而论，与决策体制的重要性以及复杂性并不符合。本人所在工作单位，便于笔者和不同层次的决策者进行交流沟通，通过调研能够较多了解决策体制变革历程，从而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历程和前进方向。

当然，本研究不可能就中共决策体制进行全面详细的梳理。从题目来看，读者也许以为笔者要全方位研究中共决策体制。由于能力有限，笔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共中央层面的决策体制变革，而不详细考察省委、市委、县委、乡镇党委等诸多层次的决策体制变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是中共中央为推动决策更加有效而采取的变革措施及其实际成效，并在书中辅以少量案例进行分析。当然，为了佐证中共中央决策体制变革，也兼论及一些地方性决策机制的建构。

本书认为，决策体制是指在一定的决策理念指引下，由动态的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决策机制构成的制度化体系，是一个理念体系和制度体系相互嵌入构成的决策系统。本研究把决策体制分解为决策理念、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决策机制、决策特征五部分。决策理念是指适合当时情况作决策所遵循的价值引导，属于隐在决策体制背后的思想观念层面；决策结构是指中共决策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决策核心层的权力配置、人员安排，党委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间的权力行使规范等；决策方式是指决策过程中使用的形式与方法，包括民主集中制、集体决、会议决、多数决、个人决等；决策机制主要是指决策过程中遵循的制度性规范，例如问责制、协商制、咨询制、听证制等；决策特

征主要是指不同阶段中共决策体制展现出的不同决策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共决策特点各自鲜明，又真实存在明显区别。当然，决策体制也会因为受到客观环境和决策主体素质变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在本研究中也予以叙述和分析。上述五个方面，在中共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出场也并不一致，有的因素在某些阶段还会缺场。改革开放以来，诸因素的表现也有阶段性差异。因此，具体展开研究时，并不严格地以五个方面分门别类加以梳理，而是以不同阶段的决策体制变化为主线进行分析。这也是考虑到不同阶段的差异，因为在某些阶段，决策体制五要素的构成并不一定健全。但总的来看，这五个要素基本构成了决策体制的基础性架构，能够反映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基本线索。

二、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和评析

研究中共决策体制，不仅涉及中共历史，还涉及政治学理论中的决策理论。所以，必须在熟悉中共历史的同时，学习和研究决策理论。为此，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时，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同时，为了较好地把握中共决策体制变革，有必要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便借鉴已有成果、汲取研究精华、提升本课题研究质量。

国外的决策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7年，美国学者卢瑟·古立克在《组织理论》一文中首先把决策视为行政管理的重要功能。此后，作为政策分析重要内容的决策研究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决策科学理论，影响较大的有J.边沁、F.W.泰勒等人提出的完全理性决策论，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决策论，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提出的渐进主义决策论，布莱恩·D.琼斯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约翰·金通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保罗·A.萨巴蒂尔提出的支持联盟框架^①等。尽管决策理论绝非任何一

^① [美] 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种抽象模型所能概括，但它们对决策类型、决策过程等要素有深入分析，为研究中共决策体制提供了“他山之石”。国内的决策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1986年7月，中共领导人万里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推动决策理论研究逐渐走上正轨。至今，中国的决策理论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国外决策学经典包括《决策过程》、《政策过程理论》等，都被译成中文出版；国内学者出版了30多部政策学方面的专著或教材，发表学术论文数以万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宁骚主编的《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陈振明主编的《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决策理论研究框架基本形成；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前述基础工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变迁，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方法启示。

就中共决策研究而言，近年来，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等论著指出，中国的决策具有中共主导和协商的特点。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提及中国的决策注重上下结合。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中国决策高效，但缺乏问责和法治约束。遗憾的是，这些论著用于分析中共决策的篇幅很小，没有专门就中共决策体制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探究。

以国内学者的研究而言，俞可平认为，中国在决策民主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从个人专断到集体决定，从暗箱操作到决策公开，从领导独断到人民参与，从随意决策到政策制定的日益制度化。^①何增科认为，在从独断

^① 2012年12月4日，俞可平在重庆作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参见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05/c40531-19802686.html>。

决策走向协商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决策权垄断和决策权分享并存的双轨或二元决策体制。^①周光辉认为,中国的决策体制变革,呈现出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转变、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转变、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转变、从被动参与决策向主动参与决策转变、从非制度化决策向制度化决策转变等趋势。^②刘峰等人则认为,中国现行决策体制是党委决策与政府执行的体制模式。^③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胡乔木的《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俞可平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基础》、周光辉的《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张明军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基本特征》、李勇军的《当代中国政治决策模式初探:构成、优势与不足》、张丽云的《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发展历程与启示》等十余篇,都有较高参考价值。尤其是周光辉的《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进行了分析,并从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决策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但遗憾的是,对中共决策体制变迁的整体性历史分析稍显简略,也未涉及中共决策体制形成的源头。国内已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分析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思想,如肖浩辉著《毛泽东决策思想研究》、周发源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戴树源著《江泽民决策思想研究》^④、刘耀京著《陈云决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2013年,国内出版了若干专门分析中央决策体制的著作。其中,王绍光、樊鹏合著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研究新医改政策出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中

① 何增科:《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的转型(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③ 刘峰、舒绍福:《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④ 《毛泽东决策思想研究》、《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江泽民决策思想研究》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

中央政府重大决策模式已由过去的“个人决策”、“集体决策”，转向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更高的“共识型”决策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在参与结构方面的特征是“开门”，包括“闯进来”、“请进来”、“走出去”；而且，政策形成之门越开越大，参与方不再局限于各级官员，还包括智库、国际组织、利益集团、普通群众等。这种模式在沟通机制方面的特征是“磨合”，包括下层协商、上层协调、顶层协议，强调总体本位、求同存异，把参与各方的交会点作为“输入点”、“商议点”，而不是“否决点”。胡鞍钢所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观点则认为，中共中央层级的决策机制是集体决策机制。这一集体决策机制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57年，主要特征是民主协商、集体决策。第二阶段是1958—1965年，决策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个人在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属于决策非制度化阶段。第四阶段是1977—1991年，属于重建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制度阶段。第五阶段是1992年至今，属于集体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阶段。胡鞍钢还就集体决策机制的运作作了简要介绍，并认为这一决策体制优越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这是对中共中央层级决策体制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某个视角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过从总体看来，目前中共决策体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已有研究的缺憾主要是：其一，论多史少，理论层面的分析多，缺乏对中共决策体制生成和演变的梳理；其二，以决策体制的弊端为政治体制改革作论证的多，研究领袖决策思想的多，注重研究决策体制自身及其发展历程的少；其三，研究决策某个要素的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其四，借鉴西方理论多，本土化框架建构少；其五，吹捧抬轿子的多，客观研究分析的少。简言之，中共决策体制研究还有较大空间。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价值

(一) 研究思路

本研究以时间为序，将中共决策体制演进分为1921—1949年、1949—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2年、2002—2012年、2012年以来六个时段，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决策体制变迁。之所以如此分期，一是考虑到决策体制变革与时代变迁的内在契合，二是考虑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替，三是考虑到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变动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则在决策体制五要素基础上，以中共决策体制演进的三条线即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中共决策机制的生成与演进、中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书中辅以少量案例佐证。最后，在分析决策体制变革路径的基础上，对现行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并对未来的决策体制变革加以展望。

(二) 研究价值

第一，从理论视域看，当下的中共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决策过程性分析、介绍而缺乏理论归纳和梳理，政治学研究则较多注重理论演绎和建构而较少关注决策体制本身的历史演进。将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即决策理论和中共历史结合起来，对决策体制进行跨学科研究，既有利于拓宽中共历史研究的视角和空间，也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研究内容。以往的决策研究，往往对党存而不论。研究中共决策体制演进，是填补决策研究缺失、把握决策体制变迁规律、建构中国特色决策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第二，从历史维度看，中共建党9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变化明显、阶段性特征突出。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爬梳，结合政治学理论的分析，对于总结经验、汲取智慧、理清演进路径、明确变革方向，不无裨益。

第三，从现实角度看，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执

政党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复杂而严峻。应对考验，化解风险，发展国家，实现复兴，迫切需要执政党提高决策水平。深入研究中共决策体制变革，明晰现行决策体制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变革之策，对于完善决策体制、提升中共决策能力，有一定价值。

四、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历史和逻辑、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制度主义方法、政策科学方法、案例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结构访谈、实地调研进行研究性分析。首先，对中共建党以来的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文献、中共领导人关于决策的论述等文献资料进行整理，进而予以历史分析。其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启动情境，关照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重大节点，突出中共领导人在决策体制变革进程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再次，运用政策分析法对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若干维度，包括决策理念、决策结构、决策机制、决策方式、决策特征五要素等进行分析，并辅以少量案例分析。最后，访谈若干不同层次的决策参与者，并结合实地调研，就决策体制的特点和问题进行提炼。

（二）基本观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共决策体制具有历史合理性，既有集中、高效、统一的优势，亦存在重经验轻制度、领袖个人决策权重过大等弊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的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显著提高，决策理念日益明晰，决策机制日益健全，决策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第三，随着决策体制变革的深入和发展，在中共中央层面，一个中共领导下的“上下结合、协商沟通、多方参与、科学论证、民本导向、集体决定”的决策模式逐步形成。第四，中共中央的决策体制，在未来会更加注重协商、更加注重科学、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三）创新之处

一是选题较新。党史学界以及政治学界，迄今还没有就中共建党9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决策体制变革，予以系统梳理的专著。二是提出了新的观点。将中共决策体制的演进路径定位为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提出中共主导的有限协商决策是中国现行决策体制的总特点，中共决策体制变革具有协商沟通战略化、信息支持多源化的趋向等观点，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决策体制的归纳，都有一定新意。三是选材比较新。本书着重挖掘与党的决策有关的制度史资料，它们在以往党史研究或政治学研究中不太受关注。

五、本书的框架设计和面临的难题

本书由导言、正文第一至六章、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进展述评、研究方法与学术框架。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决策体制的形成及其高度集中的党军决策特点，主要从中共决策体制如何受制于共产国际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分析该阶段决策呈现革命化色彩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决策体制，指出这个阶段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集体协商决策到个人专断决策的退行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党委一元化领导，权力集中于党委第一书记手中，并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决策体制演进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三章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变革的起步，时间划分阶段定位是1976—1989年。当时，中共面临双重困境：一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困局，这是中共启动变革的内部动因；二是国际竞争压力带来的困局，这是中共启动改革的外部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起步阶段，强调决策结构的调整、决策方式和决策理念的变革，强调集体决策与依法决策、决策主体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决策体制变革的目标是民主化、科学化，并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了咨询机构的作用，注意吸收专家参加决策论

证等。这个时期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呈现出决策体制变革起步阶段的特点。本章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四章就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的发展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1989—2002年，从决策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三个角度分析这个阶段的决策体制变革，突出对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决策思想进行分析。本章最后一节中共对这个时期的决策特点成因进行分析，并用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走出去”战略制定与实施为案例，对这个阶段的中共决策体制变化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第五章就中共决策体制的完善进行分析，时间跨度是2002—2012年，主要就决策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的继续完善进行分析。本章最后一节对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以“十二五”规划的起草为案例，来分析该时期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第六章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新变革进行分析，时间跨度是2012年以来。这个阶段，中共的决策体制继续沿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路径演进。决策理念强调以民为本，决策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决策方式更加注重科学、协同、整体，决策体制更加健全，决策特征更加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结语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的变迁路向进行总结提升，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体制的演进路径是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分析中国现行决策体制的特点与问题，指出走向协商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体制变革的重要维度。

对此研究，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你没有亲历决策，怎么能了解现场？如何回到决策现场，确实是笔者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这也是还原历史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笔者采取的应对办法是，从重大决策的会议记录里、从当事人的回忆录里、从公布的重要文献里……积极参与决策过程，梳理决策机制的变迁，力图回到决策现场。信息总是不对称的。为更好地还原中共决策体制的运作，笔者还分析了一些材料相对比较丰富的决策案例，来折射中共决策体制的变化。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尽量描绘中共决策体制变革的路线图。